



JICS

*Journal of Integrated Cultural Studies*

**JICS Vol. 1, No. 1, 2026, pp.115-126.**

**Print ISSN: 3105-840X; Online ISSN: 3105-841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ICS.26.1.11>**



## 论 1990-2000 年代香港北游纪行中的山川书写

王嘉愉 (Wang Jiayu) , 侯桂新 (Hou Guixin)

**摘要:** 在 1990-2000 年代, 随着香港回归进程的推进, 许多香港作家得以亲身深入大陆游览访学, 并尝试在《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香港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发表北游之旅的所见所感,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北游纪行”书写风格。山川书写是北游纪行文章的一大特色。在内容呈现上, 书写者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山川的自然风貌相融合, 注重挖掘山川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书写者通过引用和改写文学经典, 与文人墨客及其名作进行跨时空的互文性对话, 唤醒了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让山水在文学层面获得了“永恒性”的特征。而透过书写策略的选取, 可以窥见书写者对文化身份的追寻与建构实践, 从而探求山川书写背后的文化动因。

**关键词:** 山川书写; 北游纪行; 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 王嘉愉,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 [wjy\\_cll2026@126.com](mailto:wjy_cll2026@126.com)。侯桂新 (通讯作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 [hoguixin@scnu.edu.cn](mailto:hoguixin@scnu.edu.cn)。

**Title:** On the Mountains and Waters Writing in Hong Kong Northern Travelogue of the 1990s-2000s

**Abstract:** In the 1990s and 2000s, as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drew near, many Hong Kong writers gained opportunities to travel deep into the mainland for sightseeing and academic visits. They began publishing their impressions and

observations from these northbound journeys in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such as *Wen Wei Po*, *Ta Kung Pao*, and *The New Evening Post*, gradually cultivating a distinctive style of "northbound travelogue" writing. Landscape writing emerged as a defining feature of these travel narratives. In terms of content, writers blended their person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with the natural features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historical sedimentation embedded within the landscape. By quoting and rewriting literary classics, they engaged in intertextual dialogu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with historical literati and their masterpieces, awakening shared cultural memories of the nation and endowing the landscape with a quality of "eternality" at the literary level. Meanwhil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chosen writing strategies, one can glimpse the writers' pursuit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re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cultural motivations that underlie this landscape writing.

**Keywords:** Mountains and Waters Writing; Northern Travelogue; Cultural Identity

**Author Biographies:** **Wang Jiayu**,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directi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wjy\_cll2026@126.com. **Hou Guixin**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Supervisor. Research directi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houguxin@scnu.edu.cn.

1982 年中英谈判启动后，香港回归进程正式开启。1984 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 年该声明正式换文生效，香港由此进入从殖民地向特别行政区身份转变的回归过渡期。与此同时，国家为方便香港与内地的人员往来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推进回归进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1982 年实行《关于取消对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旅行限制的请示》的规定，率先取消对港澳同胞的旅行限制；1986 年发布《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正式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港澳同胞回乡证》制度，为港澳同胞往来内地设立了便捷、稳定的证件通道；九七回归后，于 1999 年正式启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进一步优化了证件申请和使用流程。政策利好打开了香港作家和学者深入大陆游览访学的大门，使得他们有机会亲身感受祖国的壮丽山河与深厚文化。在这一背景下，许多香港作家尝试以游记、散文、诗歌等形式记录他们在内地的所见所感，并发表在香港报纸的文艺副刊上，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北游纪行”书写风格。广义而言，北游纪行可以指 1990-2000 年代香港作家前往中国大陆旅行后，发表于香港报纸副刊上的记录旅行见闻感受的文本，文体不限。在这一时期的北游纪行作品中，山川书写成为书写者描绘自然景观，展现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折射出社会变迁中复杂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山川书写也逐渐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写，山川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对于“山川书写”，本文作如下概念界定：在书写内容层面，“山川书写”以中国内地

(港澳台以外的区域) 上的山川风景为写作对象、写作题材、写作场景等, 对“山川”采取广义的理解——可以是自然地理范畴中的山体和水体, 如山峦、江河、湖泊、瀑布等, 也可以是人文活动范畴中的关隘、古迹、流域、水库、国家公园等。在书写方法层面, 是指书写者采用怎样的表现手法、形式结构等刻写山川, 怎样展现书写者的审美经验、创造山川的审美价值。在书写者层面, 山川书写者当为香港作家, 此处采用中国香港学者黄维樑 (1987) 对香港作家的广义分类: “第一, 土生土长, 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的; 第二, 外地生本土长, 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的; 第三, 外地生外地长, 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的; 第四, 外地生外地长, 在外地已经开始写作, 甚至已经成名, 然后旅居或定居本港, 继续写作的。”

本文将聚焦 1990-2000 年代的“山川书写”, 主要以这一时期《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文艺副刊上的北游纪行文章为研究材料, 探究“山川书写”的呈现内容、写作特征及其隐含的文化动因。

### 一、山川之态: 北游纪行中山川书写的呈现

1990-2000 年代, 香港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不断拓展着城市的边界线和天际线。与此同时, 一批香港作家顺应陆岛交流的政策, 深入祖国内地, 在名山大川下书写自己的北游纪行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呈现的山川超出了一般的风景描写, 书写者把山川当作永恒的精神坐标, 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山川的自然风貌相融合, 注重挖掘其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 赋予山川以独特的文化意义。

#### (一) 龙蟒之形与美人气质

在书写者游览名山大川的旅途中, 不同书写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虽然有所不同, 但在描写山峦和江河时, 不少书写者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龙”“蟒”来比喻山河连绵壮阔的形态, 在描写湖泊时, 则常选用“美人”来表现其柔美恬静的气质。

如羊城 (1993) 的《长江游》: “峰峦万里, 峡削千崖/你已蜕变为一条蟠屈可怕的巨蟒。”再如王方 (1995) 的《福建旅游诗钞》中对武夷山的描写: “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千里的山脉地区。”书写者以“龙”“蟒”描绘山峦, 不仅取其形似, 更是将民族图腾的意象投射于山川之中, 在自然风貌中寻找文化精神的表达。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 龙图腾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识, 可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文化符号和标识 (王宪昭, 2023), 且龙图腾在炎黄集团形成之时已被确立为族源标志, 故中华民族又称为“龙的传人”。在 1990-2000 年代, 面对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 书写者也有意认同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的身份, 因此在山川书写中还可以看到许多书写者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如舒慧 (2006) 在《黄河魂》里书写的: “是去追赶/地老天荒的爱/还是要/激涌出属于炎黄子孙之魂。”以及孙重贵 (1995) 在《黄河之魂——壶口瀑布》中所写: “无论命运把我抛到天涯海角/永远是顶天立地的龙的传人。”而“蟒”所对应的蛇图腾有“龙蛇同源”说的推断, 即“蛇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前身” (陆晓云, 2013)。不论是“龙”还是“蟒”, 当它们出现在山川书写中时, 仅把它们当作是对自然山峦形态的描摹是远远不够的, 这类书写暗含的是一种对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对民族归属感的追寻。当书写者行旅于山川之间, 以“龙”“蟒”形容所见, 他们不仅在描绘眼前之景, 还在书写一种共同

的民族文化血脉。

相较于壮阔宏伟的山河，湖泊则显得小家碧玉，“龙”“鳞”也不再适用于描写湖泊，于是书写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湖泊拟作“美人”。如万振环（1998）在《泛舟瘦西湖》中这样形容瘦西湖：“因为‘瘦’，她的景观显得更加紧凑，也格外小巧玲珑，就好像是一个脸容俊俏、亭亭玉立的姑娘。”书写者用“她”而非“它”来指代瘦西湖，将瘦西湖拟人化为一位娇小端庄的“美人”。同样的用法在马鼎三（1997）的《钱塘湖留晚》中亦有出现：“西湖留晚本属无心，然而出乎意料却一睹这位‘睡美人’的芳姿……她被历史积淀，雕塑，如泱泱湖水，巍巍青山。”除了湖泊，河西走廊这样地貌类型多元且广阔的山川集合地，也能被书写为：“河西走廊像一位热情姑娘，眨动美丽的眼珠，摆弄绣花的衣裙，向远方来客张开双臂。”（郑莹，1994）在这些山川书写中，不同自然风貌的山川拥有不同的“美人”气质和性格特征，湖泊总是与高洁脱俗、有容乃大等品质相挂钩，而河西走廊却是充满生机的热烈的姑娘。这种拟人化的呈现方法展现出大陆多样的自然环境风貌，书写者在赞美西湖和河西走廊的美丽景致的时候，观察到了祖国山川硬朗宏伟外柔美纯洁、热情奔放的一面。同时，书写者通过将山川景物人格化，既拉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还传递出对山川的深厚情感。这种呈现方式让静态的山川变得鲜活起来，仿佛她们也有了自己的故事和灵魂，进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与共鸣。

由此可见，在北游纪行的文章中，书写者对祖国山川的描写不仅流露出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热衷于表现祖国山川迥异多样的风采。

## （二）对山川的历时性观照

在山川书写中，有的书写者会站在山水之间，回望过去，或想象山水在过去某个时代的模样，或对比同一片山水在不同时代的区别；而有的书写者则会站在山水之间，展望未来，期待同一片山水在时代的变革和发展中的变化。

回望过去的山川书写如“有个女孩子沿着楼内的阶梯登上烽火台顶端……她的头顶，一面斜插的彩旗被天风吹得哗啦啦地响，豆大的雨点正疏落地拍打着高台，仿佛想告诉人们，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烽火戏诸侯’的荒唐故事。”（黄河浪，1995）时代沧桑，那些映在历史长河中的面孔早已被时间之风轻轻抹去。书写者与古人同处一片天地，然而这天地之间物是人非，唯有山川静默地见证着岁月的流转，用断壁残垣诉说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

进行新旧对比的山川书写最常见的是山川现代化建设前后的对比。如王方（1995）写湄洲岛：“本是荒凉的一片土/现在处处是开发地。”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书写者呈现的是山川与城市、山川与现代化事物的兼容共生，如祖怡（1995）写鼓山与福州城的“俯瞰山下，高楼商厦，鳞次栉比；日益繁荣的福州城，尽笼暮霭之中。”和巴桐（1994）笔下的三峡：“虽然与李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线……但现代的客轮载着我们逆水破浪，并不影响我们领略‘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意境。”而有的书写者呈现的是山川与城市的环境对比，如紫紫（1996）的“看惯了都市中马路边、巴士上的果皮烟头，来到净土般的黄山竟然连赞叹都发不出来，有的只是重重地惊叹！”前者是立在世纪末的潮头上，乘着时代的新风，感慨山川与现代化建设的兼容相生；后者则更表现出对区别于喧嚣城市的“净土般”的山川的向往和对自然原始之美的深深眷恋，在现代化浪潮席卷香港之际，祖国山川便自然成为都市人内心深处纯净

与安宁的寄托。还有的书写者则对现代化建设给山川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触目尽是黄土坡灰矿坑秃田瘠/远影已非轻舟，千里不闻猿啼/山山横我的翠微啊/只许写入唐诗宋词/防风林后面是防风林/抗洪堤尽处是抗洪堤/船行处，但见景观人造泥涛翻涌/河浊江清，怕已成为神话传说。”（羊城，1993）在书写者看来，随着现代化人造景观的兴建与开发工程引发的环境破坏，山川之景正在被逐渐吞噬，这不仅破坏了自然风光的原始风貌，更消解了人们受自然风光触动而萌生的诗意。这种山川书写试图唤醒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提醒世人珍惜那些尚未被完全开发的土地残存的诗意山水。

展望未来的山川书写有如黄萍（1998）写鼓浪屿：“鼓浪屿像一艘古老战舰/在开放改革的春潮里/迎着朝阳披着彩霞/向着 21 世纪扬帆远航。”如此提到“改革开放”的山川书写还有郑莹（1994）对国家开发黄沙漫天的西北的描述：“热热的愿望同拼搏的汗水呵，明天的路程更长远道路更艰辛，需要骑上改革的骏马！”希望改革的脚步能让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时代沧桑，山川永恒。书写者或回望历史，描摹千百年前同一片山河的面貌，探寻保存在山川里的记忆；或立足当下，观察现代社会的发展对自然景观带来的变化；或展望未来，表达对山川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美好祝愿。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山川都为书写者们提供了想象与创造的广阔空间。

## 二、山川永恒：山川书写的策略与特征

山川书写向读者呈现出多样化、象征化的祖国山河，书写者在描绘山川时，往往不局限于对自然景物进行外在描写和直接描写，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象征，在引用和改写文学经典的过程中赋予山川独特的“互文性”意义，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纽带，引发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而坐落在广袤山川中的历史文化古迹，则能勾起书写者作为中华民族这一集体中的一员的文化记忆，使其利用山川书写唤醒沉睡在古迹中的文化记忆。

### （一）互文性对话与跨时空共鸣

在北游纪行作品的山川书写中，书写者与文人墨客及其名作的“对话”极为丰富。这种“对话”可以看作是书写者思想与前人思想、纪行文章与前人名作之间的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表现。自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开创“互文性”这一术语以来，互文性理论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学者李玉平（2014）在综合国内外对互文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互文性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功能上的定义：“互文性是指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简而言之，互文性就是“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殷企平，1994，p.39），是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通过互文性表现，书写者能够以山川为不变的“永恒”坐标，探寻文人墨客在同一坐标上留下的痕迹，借助这些痕迹，表露当下自身对山川之景的切身体悟。

在山川书写中，书写者或带着文本走入山川，在山川间体验、印证文本中的描写和情感，从而创作出各种各样的山川书写互文本；或在山川中触景生情，感悟前人文本中的深意，将

自身情感与文本内容相融合，从而在互文本中实现一种与文本的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不论书写者采用了哪种互文方法，山川书写中最明显的互文性类型当是引用，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马鼎三在《钱塘湖留晚》中就运用了大量的直接引用。书写者酒酣后漫步在西湖的夜景中，结合自己眼前之所见，想象着文人墨客在钱塘西湖中吟诗抒情的场景：“白沙堤上，似觉香山居士迎面渡来，轻摇羽扇，神情眷眷：‘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遥视六桥苏堤，隐隐约约，坡翁正风尘仆仆，眼看‘古岸开青葙，新渠走碧流’的喜人景象，悠然自得，慢捋长髯，振臂指挥：‘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马鼎三，1997）除了白居易和苏轼，马鼎三还引用了陆游、姜夔等人的诗句，仿佛穿越回千百年前，与他们共处同一山水之间，以旁观者的视角见证了名篇佳作的诞生。

除了引用，改写也是山川书写中互文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在郑莹（1994）的散文诗《大西北咏叹调》中，将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改写为“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把“春风不度玉门关”改写为“春风浩荡玉门关”。通过这样的改写，郑莹不仅保留了原诗的意境和韵味，还赋予了新的情感内涵。用“黄沙”取代“黄河”，更鲜明地凸显了大西北的荒凉与壮阔；用“浩荡”取代“不度”，则彻底拂去了原句的悲凉意味，既传递出豪迈之情，也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发西部地区的蓬勃希望。这种互文性使得古典诗歌在当代文本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时也让读者在对比中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情感碰撞。

在这样的互文性表现中，山川是联系文本与互文本之间的纽带，书写者因与前人身处同一片风景中而产生文学共鸣。相对于人类历史的长度和生命的长度来说，山川固然是屹立不动的“永恒”之物，但真正赋予其超越时间的“永恒”的文化意义的，是古今文人在创作上的互文性表现。在这种互文性的书写中，山川景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而是承载着文学文本和人文情感的文化符号。通过这种互文，文本与互文本相互映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山川书写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时间维度，而是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在书写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超时空的精神联结，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密相连。

## （二）唤醒民族文化记忆

在山川书写中，书写者常置身于山川之间的历史文化古迹中，在古迹的岁月刻痕下回望历史，追忆那些曾发生于此的历史故事和曾生活于此的历史人物。如黄河浪的《苍古的骊山》一文。书写者游览骊山，到以温泉闻名的华清池时，想起唐玄宗曾大兴土木，沿山麓建造华清宫，设置了皇帝和贵妃专用的浴池，便因着白居易的《长恨歌》，遐想那位千娇百媚的妃子和她专权弄国的哥哥。那些年，“骊山脚下，华清宫里，一派歌舞欢乐的热闹景象”，谁曾想，贵妃会在距离华清宫只有一百多里的马嵬坡上长眠。千年以后，“浴池已干，歌舞已歇，只有苍古的骊山，见证着悲欢离合的一场场春梦”。（黄河浪，1995）当作者因身处华清宫、想起《长恨歌》而回忆起一段民族共同的历史的时候，他已经唤醒了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

“文化记忆”理论最早由德国理论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通常包括了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王霄冰，2007），文化记忆通过“仪式一致性”和“文本一致性”（扬·阿斯曼，2015，

p.86) 区别于一般的社会记忆, 实现交流和传承。在《长恨歌》《长生殿》《梧桐雨》等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 其主要人物、核心情节、悲剧内核大致相同, 保持了“文本的一致性”。二人的故事经过文学精英的整理和再创后逐渐经典化并超越历史事实本身, 升华为关于爱情、权力、命运与盛衰转折的民族文化符号, 使文本的生命力延续至今, 因而《长恨歌》这一经典文本能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华清宫山川书写中, 成为唤醒关于唐杨故事的文化记忆的媒介。上文论述的“互文性”表现, 实际上也是在利用文本的一致性, 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引用和改写, 实现文化记忆的再现。

与这种依靠文本经典化实现文化记忆传承的模式不同, 《长流不息的盐泉》所展现的, 则更接近于阿斯曼所强调的“仪式一致性”的文化记忆路径。文章中的山川书写主要是通过纪念性的建筑物中举办庆典仪式来唤醒文化记忆。以盐泉闻名的四川自贡, 自清朝便吸引了大量盐商聚集, 西秦会馆便是陕西盐商合资建造的盐业会馆, 因供奉着关羽神位, 故又称关帝庙。盐商在西秦会馆里“祭神议事, 聚会宴乐”(黄河浪, 1993), 虽然如今的盐商早已不在会馆里举办祭神仪式, 但历代以来, 在会馆修缮、题名、拜谒等仪式中, 关于盐泉和盐业的文化记忆都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媒介传承了下来。现如今, 西秦会馆已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 内部还设有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对外开放, 向人们介绍中国古代盐井的历史演变和井盐生产技术等, 它的记忆传承方式也随之发生了现代转换——从盐商群体内部的祭祀宴乐, 转变为面向公众的知识普及与历史文化展示。西秦会馆从清代盐商的同乡会所, 到今天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专题博物馆, 其功能虽几经变迁, 但核心的记忆线索始终围绕“盐泉”这一物质与文化的双重源泉, 在山川书写中被重新看见并激活。

不论是《长恨歌》等经典文本的一致性还是西秦会馆仪式的一致性, 书写者都是因为身处于某一特定古迹中而产生了特定的文化记忆。山川书写不仅聚焦于自然地理范畴的山体与水体, 还聚焦于人文活动范畴中的山水名胜。华清宫和西秦会馆都是山川之中的历史文化古迹, 在香港临回归之际, 山川书写者能够自觉关注到这些承载着集体文化记忆的山川古迹, 通过重新书写这些古迹, 将原本可能零散的、沉寂的地方性历史文化资源呈现出来, 对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宏大民族叙事有重要意义。但华清宫和西秦会馆等古迹只是祖国广阔山川中的一隅, 无人能预测若干年后它们的结局, 因而最终能够唤醒书写者的文化记忆的仍是为这些古迹提供地基的“永恒”存在的山川, 正如黄河浪(1995)所写:“骊山以古建筑为碑, 刻记下千古兴亡的故事。”也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2016, p.344)所说:“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 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 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 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 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

总而言之, 山川书写中的互文性表现体现了山水在文学层面的“永恒性”特征, 山川中的古迹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成为文化记忆的永恒载体。而引用、改写经典山水名篇的互文性表现也可以被视为利用了文本一致性, 唤醒了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书写者展现这些文化记忆, 本质上都是为了从中找寻并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

### 三、身份追认：山川书写的文化动因

自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正式换文生效以来，香港便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混杂性’是回归过渡期香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徐诗颖，2017）。一方面，拥有长达一百五十多年殖民历史的香港不得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由岭南文化、中原文化等共同构成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因而当“九七”回归的议题正式提出以后，香港再次面对两种社会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体系的冲击，香港文学就带上了鲜明的“混杂性”（hybridity）文化身份特征。而1990-2000年代的山川书写，也体现了香港文学对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索意识。

在山川书写中，不管书写者是引用、改写经典文本，表现出互文性，与前代的文人墨客进行跨时空“对话”，再现文化记忆，还是在古迹前根据文本一致性或仪式一致性来唤醒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归根结底都可以被理解为书写者试图通过山川书写追认自身的文化身份，因为“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赵静蓉，2015）。然而除了通过唤醒文化记忆来定位文化身份，书写者还利用了文化身份本身的特性，如动态性，来反抗西方构建的完整的、稳定的、作为殖民地的文化身份。

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理论中，“人不是脱离历史而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赋予个体特定的身份位置。但这个位置只是暂时的，车在行驶，位置就永远在改变；历史在演进，身份的意义就永远在滑动。”（徐明玉，2019，p.123）由此可见，文化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动态性特征的、特定时空下的产物，也是具体历史、文化中的产物。

书写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揭示了文化身份的动态性。

#### （一）时间维度的文化身份定位

在时间维度上，没有长久的、一成不变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是随着时间流动，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根据霍尔的观点，文化身份是历史构建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殖民权力常通过固化某一历史起源与叙事，塑造被殖民者永恒不变的文化身份。而对于处于回归过渡期乃至回归后的香港而言，这种恒定的身份认同需要被重新审视。书写者通过在山川游记中频繁回溯中华文明的历史，尝试把被殖民历史切断的自身文化历史重新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连接起来，从而定位自身文化身份。

有的书写者直截了当地自称“龙的传人”，有的通过在山川中怀古吟诗来追寻中华文明的根源，还有的直接把山川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和象征。例如山河（1998）就把长江当作“母亲河”和“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万里长江就好比是一条历史的长河，是中华文明在神州大地上刻下的轨迹，每一朵浪花，每一声低鸣都是文明的见证。诗句可以流传，景观可以保留，但愿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可以和这滚滚不尽的江水一样，一代一代生生不息，传承延续，发扬光大。”这种山川书写把长江塑造为一部流动的、连续的民族文明史，直观地展现了书写者对中华文化连续性、生命力和包容性的深刻理解。通过认同与祝愿这样的一部文明史，书写者在被殖民者切断的、无所皈依的文化身份中寻找突破口，重建香港与大陆在中华文化上的血脉关联，并最终将文化身份定位在中华文明的谱系上。同时，书写者不仅通过长

江回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还始终注意文化身份的动态性特征，没有将中华文化描述成一个静态的仅供怀旧的“遗产”，而是利用长江水“滚滚不尽”的特点，肯定了中华文化面向未来、开放发展的能动性，让自身的文化身份在未来的历史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被建构。

## (二) 空间维度的文化身份构建

在空间维度上，书写者主动响应陆岛交流互动的政策，跨过殖民地的边界，深入大陆游览、纪行。而书写者也并非游客式的走马观花，而是如前文所论述的，主动走进山川中的历史古迹，在古迹前唤醒文化记忆。如寻名(1995)《登长城》一诗：“秦时明月，汉家烟尘……你沉睡于辉煌的回忆中……假若手牵手拉一条更长更长的长城/你会飞升吗/——我的龙族。”除了“汉家”“龙族”所展现的直观的民族身份认同之外，书写者还回望了长城的历史，想起它在抵御外敌，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长城不仅是一道物理屏障，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精神象征。

然而，在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人们在推崇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忽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根基。(刘光健，张慧诚，2025, p.102)面对这一困境，部分书写者试图通过身体的“在场”，与祖国山川空间建立起物质性的、整体性的联系，继而在凝视、聆听、感受中激活空间所蕴含的文化意涵，最终将这些意涵内化为文化身份认同。如羊城(1993)的《昆明湖》：“好想把沾满风尘的体魄/交给树任其斜/在雨中洗涤/在清流里静养。”书写者不再是一个旁观的游客，而是渴望成为这片山水的一部分，在祖国山水的浸润中获得精神的洗涤与归属。

不论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书写者都是在利用文化身份的动态性特征，试图将香港从殖民话语中孤立的、断裂的、停滞的文化身份枷锁中解放出来，将其重新安置于一个源远流长、奔流不息、面向未来的中华文明体系之中，从而为建构一个动态、自主、混杂、有根的文化身份开辟了道路。

## (三) 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王宁(1999, p.48)曾把“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等同于“文化认同”，但阎嘉从identity的翻译、词源和词性等角度把“身份”和“认同”区分开来：身份具有名词性质，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接近于一种静态的、结构性的标识；而认同具有动词性质，是“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阎嘉，2006, p.62)，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征。这种观点引出了身份研究中关于“身份”和“认同”最具争议的问题：“人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阎嘉，2006, p.62)学界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身份是流动的观点，霍尔更是运用非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身份是由历史和文化共同定位的，是在具体的时空实践中生产出来的，永远处在建构的过程中。

由此观之，研究1990-2000年代香港作家的山川书写，可以将identity理解为“认同”，山川书写不仅是对祖国风景的描绘，更可被视为一种深刻的文化认同实践。在叶延滨(2003)的《张家界水墨》中，把张家界这一物理空间转化为一幅水墨画，并强调自我与山川画卷的融合：“我撑着一把伞/怕我被云雨中隐没的那柄狼毫/浸为张家界一片云/点为张家界一棵树

/凝为张家界一粒石……水墨张家界长轴真长啊/长得我心融入这幅画/我的脸融入这幅画/眼融入这幅画。”书写者用“水墨画”这一中国传统的绘画形式和审美方式，从游客转化为画中人，有意将身体融入山水空间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打破文学与绘画艺术壁垒的跨界实践——书写者用文字描绘出一幅“水墨画”，将自然山水转化为艺术图像，实现了从现实空间到艺术空间的转化。同时，由于书写者不再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而是主动地将自己的身体、情感、精神融入山水之中，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世界之中，因此这种归属感，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身份宣称，达到了精神层面对中国文化空间文化认同。这是书写者在不同的山川空间中，通过身体的、实践的、诗意的参与来定位自身文化身份，并进一步完成身份认同的具体体现。

概而论之，书写者并非被动地接受和坚持某种既定的文化身份，而是主动地走进祖国的山川之中，通过审美体验、互文对话、唤醒文化记忆等一系列书写行为，动态地追寻并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参与到香港文化身份的建构之中，从而在九七回归的历史语境下，完成了一种具有能动性、反思性的文化身份认同。换言之，山川书写不仅是书写者定位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达，更是其文化认同得以实现的途径。

### 结语

1990-2000 年代北游纪行中的山川书写，是香港作家在九七回归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文化身份探索的重要文本实践。通过多角度的自然描写、互文性的文学对话与文化记忆的唤醒，书写者不仅描绘了祖国的壮丽山河，更在山川书写中完成了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动态建构。山川作为“永恒”的地理与文化坐标，也成为连接香港与大陆、历史与当下、个体与集体的精神纽带。但当前研究对书写者采取了广义的界定，未来或可以从书写者的身份出发，探究南来作家、旅居香港的作家、香港本土作家等不同写作主体在山川书写方面的特点，甚至引入香港作家与大陆、台湾地区、澳门及海外华文作家在山川书写上的异同对比。也可进一步将研究时段拉长，观察回归过渡期前与“后九七”香港作家山川书写的新变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1949—2022）”（22&ZD276）之阶段性成果。

### ORCID

Wang Jiayu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2-4200-7334>

Hou Guixi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1213-2102>

### References

- 巴桐（1994年6月12日）：《三峡咏叹》，《文汇报·文艺》，6月12日，第7版。  
[Ba Tong (1994, June 12). "Ode to the Three Gorges".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7.]
- 黄萍（1998年8月9日）：《鼓浪屿之夜》，《文汇报·文艺》，8月9日，第5版。  
[Huang Ping (1998, August 9). "Night at Gulangyu Island".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5.]
- 黄河浪（1993年9月26日）：《长流不息的盐泉》，《文汇报·文艺》，9月26日。

- [Huang Helang (1993, September 26). "The Ever-flowing Salt Spring".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黄河浪 (1995年8月13日): 《苍古的骊山》, 《文汇报·文艺》, 8月13日, 第8版。
- [Huang Helang (1995, August 13). "The Ancient Mount Li".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8.]  
黄维樑 (1987): 《香港文学初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Huang Weiliang (198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刘光健、张慧诚 (2025): “主体与流动——转型期藏族诗歌的族裔空间问题”, 《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1): 102-113。
- [Liu Guangjian, Zhang Huicheng (2025). "Subjectivity and Mobility: Ethnic Spatiality in Tibetan Poetr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1): 102-113.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12> ]
- 陆晓云 (2013): “蛇图腾符号的艺术风貌与文化特征”,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78-82。  
[Lu Xiaoyun (2013). "The Artistic Styl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nake Totem Symbols".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1): 78-82.]
- 李玉平 (2014): 《互文性: 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  
[Li Yuping (2014). *Intertextuality: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Theory*. The Commercial Press.]
- 马鼎三 (1997年9月28日): 《钱塘湖留晚》, 《文汇报·文艺》, 9月28日, 第7版。  
[Ma Dingsan (1997, September 28). "Lingering at Qiantang Lake in the Evening".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7.]
- 山河 (1998年10月28日): 《三峡小游》, 《大公报·文学》, 10月28日, 第7版。  
[Shan He (1998, October 28). "A Short Tour of the Three Gorges".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p.7.]
- 舒慧 (2006年10月1日): 《黄河魂》, 《大公报·文学》, 10月1日, 第8版。  
[Shu Hui (2006, October 1). "The Soul of the Yellow River".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p.8.]
- 孙重贵 (1995年5月17日): 《黄河之魂——壶口瀑布》, 《大公报·文学》, 5月17日, 第8版。  
[Sun Chonggui (1995, May 17). "The Soul of the Yellow River: Hukou Waterfall".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p.8.]
- 万振环 (1998年10月25日): 《泛舟瘦西湖》, 《文汇报·文艺》, 10月25日, 第7版。  
[Wan Zhenhuan (1998, October 25). "Boating on Slender West Lake".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7.]
- 王方 (1995年4月30日): 《福建旅游诗钞》, 《文汇报·文艺》, 4月30日, 第7版。  
[Wang Fang (1995, April 30). "Travel Poems of Fujian".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7.]
- 王方 (1995年7月2日): 《福建行吟》, 《文汇报·文艺》, 7月2日, 第9版。  
[Wang Fang (1995, July 2). "Chanting in Fujian".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9.]
- 王宁 (1999):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外国文学》(04): 48-51。  
[Wang Ning (1999).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Literary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 (04): 48-51.]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1999.04.012>
- 王霄冰 (2007): 《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民族出版社。  
[Wang Xiaobing (2007). *Writing, Ritual and Cultural Memory*.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王宪昭 (2023): “‘中华文化共有符号记忆’系列之一龙图腾: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 《中国民族教育》(06): 62-64。  
[Wang Xianzhao (2023). "Dragon Totem: The Common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Part of the Series 'Memory of Shared Symbols in Chinese Culture')". *Ethnic Education of China* (06): 62-64. DOI: <https://doi.org/10.16855/j.cnki.zgmzjy.2023.06.009> ]
- 徐明玉 (2019):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生成轨迹”,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 123-128。  
[Xu Mingyu (2019). "The Trajectory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4): 123-128. DOI: <https://doi.org/10.19496/j.cnki.ssx.2019.04.021> ]
- 徐诗颖 (2017) : “论回归过渡期香港文学的‘混杂性’文化身份——以反映本土意识的香港小说为考察对象”,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07) : 42-49.
- [Xu Shiying (2017). “On the Hybrid Cultur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fore the Handover: A Study of Hong Kong Novels Reflecting Local Consciousness”.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07): 42-49.]
- 寻名 (1995年12月3日) : 《登长城》, 《新晚报·晚风》, 12月3日。
- [Xun Ming (1995, December 3). “Climbing the Great Wall”. *Modern Evening Times · Evening Breeze.*]
- 阎嘉 (2006) :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江西社会科学》 (09) : 62-66.
- [Yan Jia (2006). “Issue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Literary Studie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09): 62-66. DOI: <https://dx.chinadai.cn/10.3969/j.issn.1004-518X.2006.09.013>]
- 羊城 (1993年6月2日) : 《长江游》, 《大公报·文学》, 6月2日。
- [Yang Cheng (1993, June 2). “A Tour of the Yangtze River”.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 羊城 (1993年4月21日) : 《昆明湖》, 《大公报·文学》, 4月21日。
- [Yang Cheng (1993, April 21). “Kunming Lake”. *Ta Kung Pao · Literature.*]
- 叶延滨 (2003年1月29日) : 《张家界水墨》, 《新晚报·晚风》, 1月29日。
- [Ye Yanbin (2003, January 29). “Ink Wash Painting of Zhangjiajie”. *Modern Evening Times · Evening Breeze.*]
- 殷企平 (1994) : “谈‘互文性’”, 《外国文学评论》 (02) : 39-46.
- [Yin Qiping (1994). “On Intertextualit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02): 39-46.]
- 赵静蓉 (2015) :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Zhao Jingrong (2015).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郑莹 (1994年2月20日) : 《大西北咏叹调》, 《新晚报·晚风》, 2月20日。
- [Zheng Ying (1994, February 20). “Aria of the Great Northwest”. *Modern Evening Times · Evening Breeze.*]
- 紫紫 (1996年12月8日) : 《黄山随想》, 《文汇报·文艺》, 12月8日, 第3版。
- [Zi Zi (1996, December 8). “Random Thoughts on Mount Huangshan”.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3.]
- 祖怡 (1995年5月7日) : 《鼓山游记》, 《文汇报·文艺》, 5月7日, 第6版。
- [Zu Yi (1995, May 7). “Travel Notes of Gushan”. *Wen Wei Po · Literature and Art*, p. 6.]
- 阿莱达·阿斯曼 (2016) :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 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Assmann, A. (2016). *Memory Space: The Form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Cultural Memory*, translated by L. Pa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扬·阿斯曼 (2015) :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Assmann, J. (2015). *Cultural Memory: Writing, Recollec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Early High Cultures*, translated by S. Jin, X. Hua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